

# 两会，敲响改革的鼓点

## 余额宝动了谁的奶酪

过去的一年，身边的大事不断有新进展。“打老虎”的铁拳，锤落一批重量级高官；八项规定成为铁律，规范干部的一言一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在拆除干部群众间的那堵墙；啃硬骨头、涉险滩的改革，迎来顶层设计与“摸石头”结合的黄金时期。人民网日前的一项调查显示，社会保障、反腐倡廉、食品药品安全暂居今年两会热点前三。50多万网民，用他们的参与传递着民意，有肯定，也有期许。而热点的“变与不变”间，折射出中国巨轮航行的轨迹。

以社会保障为例。近年来，增进民生福祉始终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托底意识与保障能力日益强大，民生安全

网越织越密。从新农合的试点、扩面、保证公平，到“新农保”与“城居保”合并，再到完善低保、大病救助制度，“社保成绩单”亮点频现。而民众对社会保障问题的持续关注、权利意识的不断强化，更是一种提醒：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是我们党和政府奋斗的目标。

若说去年以来百姓感受最深、最为满意的，要属反腐倡廉。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之大，远甚以往任何时期。铁腕治吏之下，极大增强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凝聚了社会力量，激发了信心活力。此时，人们依然密切关注反腐倡廉，但已不是对打“老虎”勇气的怀疑，对不能拍死“苍蝇”的忧虑，而是期盼在制度创

新、简政放权、政务公开方面有更大突破，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

群众得到实惠，热词可能变冷；群众有新要求，热词可能保温；问题久拖不决，热词可能“高烧不退”。清欠农民工工资、减轻农民负担、杜绝教育乱收费等问题较好解决，话题自然淡出。而环境保护则因为持续的雾霾，再次成为关注焦点。如何对症下药、重现蓝天？一位行为艺术家放出蓝色烟雾，试图“染”蓝天，既显得荒诞，又让人心酸。不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美丽中国”恐怕只能是挂在墙上的蓝图。

如果把这些热点放到更广阔的改革背景下，不难理解，“不深化改革不

行，深化改革力度小了也不行”的话语，可谓意味深长。最让百姓心焦的“看不起病、养不起老”，难在破除双轨制；收入分配形成“橄榄型”结构，难以打破既得利益；稳定菜价、房价，难以调控供需矛盾，遏制炒作行为；推进城镇化，难以避免“大城市病”，让农民“记得住乡愁”。既得利益群体已然存在，利益藩篱日趋固化，唯一的出路，就是啃硬骨头、涉险滩，全面深化改革。

两会开幕已经开启。5000多名代表委员，从四面八方带来一份份议案提案，也带来百姓心声。期待这些心声变成改革的鼓点，更期待改革“好声音”能变成发展新成绩。

马跃峰

春节过后，关于余额宝的讨论变得激烈起来，先是短文新发文批评余额宝抬高了融资成本，搅乱了金融秩序，理应收缩；后是2月末中国银行业协会呼吁，将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货币基金存放在银行的存款纳入一般性存款管理，按规定缴纳存款准备金。这一呼吁如果成真，意味着余额宝中20%的资金将被冻结，收益率将下降1/5以上。

改革开放30余年来，尽管下游产品早已市场化，价格由供需决定，但上游要素价格仍然受到严格限制，土地如此，资金亦如此。这就难免出现和上世纪80年代一样的桥段，当时，物资方面“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双轨格局，使很多人成了倒爷；如今，资金价格的双轨，也让货币市场基金——比如人们俗称的理财产品——异常火爆。

如果我们想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余额宝不仅不能通过市场价格牟利，它压根就不能存在；如果我们

坚定地走市场经济道路，就得承认资本逐利乃是天性。既然如此，取缔从何谈起？另外，2009年以来，银行界的理财产品层出不穷。既然银行可以透过理财产品，将资金从资产负债表内挪到资产负债表外，一来回避巨额存款准备金，二来获取市场收益，余额宝等互联网理财产品为什么不可以？

尽管央行近年来在矢志推动利率市场化，目前也仅剩存款利率管制没有解除，但由于金融市场主体——国有商业银行——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温室效应的路径依赖，扎根于市场的余额宝自然不易被容纳。中国银行业协会之举，令人想起去年发生的类似桥段：中移动和中联通联手工信部，一度对微信展开围剿。

余额宝的出现，令沉淀于银行一般性存款中的资金得以盘活。这一符合历史潮流的金融创新，在黏性极强的数字化淘金用户的推动下，已很难阻挡。

杨中旭

## “研究生泛滥成灾”当反思教育积弊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石定果3月1日表示，中国的研究生规模必须控制，在过去10年间，中国研究生规模增长了约10倍，但中国真的需要这么多研究生吗？那么多工作岗位真的需要研究生学历的人才能干吗？可以说，研究生群体已经泛滥成灾。

短短十年时间，我国研究生规模增长了10倍，高学历人才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量，成绩不可不看。表面上看，研究生扩招能提高高学历人才比例，但是，正如石定果教授质疑的那样，“研究生群体已经泛滥成灾”并非危言耸听。如果不理清高等教育积弊，研究生“大饼”越摊越大，不仅加剧就业矛盾，也造成了高等教育资源浪费。

当前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人才浪费的问题突出。研究生虽然学历层次高，但是由于目前研究生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的矛盾，导致研究生没有从事与其学历、专业相适应的工作。另外，师资队伍建设和没有同步跟进，高校学术腐败、导师把研究生当作廉价劳动力的情况比较普遍。教育部副部长黄宝印曾坦言，博士培养面临着规模和数量较大但质量严重不足的问题。数据显示，我国每位博导平均带5.77名博士，比例远远高于国外大学。这就是佐证。

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就业不理想。若高校为了暂缓就业压力，继续扩招研究生，显然不可取。“大学之谓，非大楼也，乃大师也”。大学房子越盖越豪华，甚至参与房地产开发，建造五星级路酒店。大学精神不断沦落，值得反思。显然，改良高等教育生态，主动适应社会需要，研究生教育应由追求数量向注重质量华丽转身，显得迫切而必要。如果不下力气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调整学科、产业结构，一味扩招研究生应对就业难，缓冲以后可能造成更大的就业矛盾与社会问题。

叶祝颐

## 税负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日前在“第二届卓亚法论坛”上提出，我国税负的90%甚至更多都压在企业身上，他建议通过税制改革增加居民个人缴纳税收的比重。

焦海洋/图



## 为“公务员”祛魅不应走极端

“车改生活不改”，2月28日，福建厦门一家汽车经销商打出的口号，成为网络热议焦点。这家经销商推出的一套为公职人员量身定做的零首付购车方案和广告展示图片下方的诸多豪车车标，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有网友认为，此举涉嫌消费歧视，是在制造新的社会不公。(3月2日《中国青年报》)

“公务员”曾是众人艳羡的工作，编制雷打不动，薪资早涝保收，附着在这份职业上的诸多利好，甚至催生了许多诡异的观念，“非公务员不嫁”的婚恋观，“非公务员不干”的求职观……然而，职业的光环随后又由于许多丑闻的曝光而暗淡，吃拿卡要、腐败公弊、隐性福利，一种负面的刻板印象在民众心里扎根，以至于在中央持续的“反四风”高压态势下所导致的“公务员不好当”的抱怨，引来一致的拍手称快。

我们当然乐见对“公务员”的职业崇拜被打破，因为这意味着寄生在公权力上的腐败因

子正被抖落；但动辄将其与权力献媚联系，以及无处不在的“遇官则疑、逢官则反”心理，又不免让人担心，“公务员”这一身份，似已落入另一个极端——仿佛只有把这个职业从“神龛”中拉出来砸碎了，才是其应有的下场。

笔者并无意为公务员队伍唱赞歌，事实上，这支队伍依然问题重重。只是，单就公务员成为汽车市场目标群体这一现象而言，我们也许更应看到其所释放的正面信号。

以营销为目的的商家为不同客户“私人定制”无可厚非，可让经销商不解的是，这样一个市场驱动的促销活动，为何会衍生出“公平论”、“消费歧视论”等一系列非市场化解读呢？提供公务员“零首付”的优待，是源于职业所蕴含的社会信用度。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类似医生、律师、公务员等职业都享有以信用为担保的相关优惠。如果公务员可以“零首付”购车就是歧视普通百姓，那通讯公司推出“外来

务工人员优惠套餐”算不算歧视本地人？而把此事说成是“官商勾结的社会痼疾”则更像是“酸葡萄心理”下不假思索的冲动表达。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向特权“献媚”完全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形下进行，想必不会有商家傻到明目张胆地在广告里高呼：“官员们快来和我权钱交易吧！”

说到底，经销商的营销点子是我看了不少人对“公务员”的刻板印象上。一面呼吁制度为“公务员”祛魅，一面却又固守一成不变的偏见，甚至还走向极端，这显然无助于这一社会身份回归常态。正如李普曼所说：“刻板成见可以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但也阻碍着对新事物的接受。”对公职人员的言行常怀怀疑的精神，的确有助于调动民众的监督力量，谋求公权力的行使；但是，若民众对“公务员”的印象钻进另一种极端，并且把身份标签当做是非判断的标准，则对正在进行的改革而言，是弊大于利的。

罗晓星

## 取消头胎“准生证”具有样本意义

湖北省卫计委近日下发通知，取消一孩生育审批，该领域执行了30多年的行政审批由此变为了主动发放。这让湖北成了全国最早推行这一做法的省份之一。一些网民认为，全国范围内的合法夫妻都至少有生育一胎的权利，无需再次审批，头胎“准生证”早就应该取消了。(3月2日 新华网)

一纸“取消”通知，获得普遍点赞，被称为“带了好个头”。对于那些仍生活在“准生证”之下的民众而言，除了心生羡慕，一个直接的疑问便是，取消“准生证”何时能成为普惠式现实。于简政放权背景下，相信这类期许的实现只是时间问题。而在这份期许之外，此类改革所蕴含的样本意义，同样值得剖析。

目前大众所称的“准生证”，其实叫“生育健康服务证”，顾名思义，是孕妇和新生儿获取计生服务的凭证。此次湖北也并非取消这个证件本身，而是由以往的行政审批变为主动发放。不难想见，形式的变化，其实是服务理念的回归。在过去，正因为要获得这一凭证需要经历太多的“折腾”，使得这一证件从一项服务，异化为公民获得生育权利的确权程序，“准生证”这一名称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事实上，“准生证”这类证件，正是简政放权要重点关注的对象。在现行计生政策中，生育第一胎是任何夫妻的合法权利，本就不需再次以证件的方式予以确认。现实生活中，类似“准生证”的证件，并不少见。如果这类证件，能够在第一时间得以清理，简政放权的步伐和目标，无疑要明确得多。

包括“准生证”等证件在内的一些行政审批形式，近年来越来越受到诟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这类需要多种信息材料为支撑的证件，在办证过程中给公民制造的麻烦已愈发凸显。在最初，由于社会的流动性不大，在“静态”社会中，其弊端尚不凸显。但随着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这种证件管理方式，已经很难适应流动社会的发展，也越来越背离服务的初衷，被民众抱怨，在所难免。在这个意义上，简政放权改革必须以社会的发展背景作为重要参照对象，提升服务管理的灵活性和改革的敏感性，以动态的目光看待改革并检验改革成效。

取消“准生证”的另一重积极价值表现在，它是简政放权大背景下，地方积极探索改革路径的一种体现。改革进入深水区，在改革的方法论上，人们很容易想到顶层设计，这是改革的形势使然。但改革固然需要适时的顶层设计，地方性的改革创新和主动探索，同样不可少。这两种改革路径从来都不是对立的，而应该是互为补充，合力推进。从“准生证”之前在一些地市已经取消，但并未引起较大的跟进看，在简政放权的改革中，如何设计改革激励机制，鼓励地方勇于探索和创新，以促成甘当先行者的改革风气，值得重视。

网上舆论的普遍叫好，是民意的直接展示。这样的民意显然需要得到普遍尊重。类似的改革先行者案例所蕴藏的改革理念和其背后所彰显的样本价值，也更需要改革行动中，得到普遍的发扬。

任然

## 领导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以真挚的情感表达了儿女对父母一生无私真爱的无比感激和眷恋，也流露出人们对时光飞逝的无尽惆怅和无奈。“时间都去哪儿了”一时也成为当下最强热词红遍大江南北。

有意思的是，习近平总书记赴俄罗斯出席索契冬奥会期间，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著名主持人谢尔盖·布里廖夫专访时，他的业余爱好和时间安排的问题，也风趣地借用了这首歌。总书记说：“对我来说，问题在于我个人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当然是都被工作占去了。”

应该说，大部分党政领导干部还不只是一天工作8小时。只要是真实地深入实际了解，“很忙”的确是多数优秀党政干

部的基本生态。

优秀的党政干部为啥整天忙？当前我们国家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但国家之大，地区差异之大，社会层级之多，造成了现实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很平衡、不协调、不包容、不可持续，尤其是贫富差距、经济社会发展“一腿长一腿短”的矛盾和问题当前还很突出。这对以“为民务实清廉”要求自律的党政干部来说，必须殚精竭虑，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和谐，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时间对这些好干部来说，究竟哪儿去都被工作占去了？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比如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原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沈浩，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原乡长菊美多吉，湖北云梦县委组织部干部

长涂红刚……他们的时间就花在为人民利益的无私奉献之中。

毋庸讳言，也有一些地方、一些行业、一些领域中的领导干部，闲暇之余甚至有的利用工作时间，为个人升迁或者谋取个人利益，“走局子”、“串场子”，出入豪华会所，吃尽山珍海味……他们也很忙，但忙得是个人私利。去年一年，中央重拳出击，严厉整肃作风，清风正气扑面而来。对这些干部来说，8小时之外突然没了去处，时间一时“多了起来”、“闲了下来”，不知如何打发……

如果我们的所有党政领导干部都能端正“官念”，能以总书记为榜样，一心做好为人民服务的事，那你的闲暇时间自然也就不会无所事事了！咱老百姓也就没有遗憾了。

胡敏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311元，比上年增长10.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在人民网推出的《2014年全国两会热点调查》中，有90%以上的网友表示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3月3日 人民网)

2013年是新一届政府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虽然由于结构调整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了很大下行压力，但从权威机构发布的数据来看，2013年居民收入依然保持了稳定增长。在人民网推出的《2014年全国两会热点调查》中，收入分配问题关注

度排名第四，一边收入在稳步增长，一边收入分配问题关注度却居高不下。

造成这种差异，原因有多种。单指居高不下的房价，就让居民收入增长的幸福感消失大半。专家认为，收入的可支配性与收支匹配性是两个概念。目前来看，两者并不成正比。在不少地方，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多年来“跑不过”房价的增长，这种差距甚至有扩大趋势。人们为了买房，将大部分收入存起来或者支付贷款，所以不敢花钱。更何况钱本身也不够花，除了占据大头的住房、医疗、教育这两项支出也是人们的“后顾之忧”，且渐有增长之势。这就造成了人们对收入的增长普遍感受不明显，心理压力反而越来越大。

除此之外，也不能忽略“马太效应”的存在。马太效应是指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一种现象，用以描述社会生活领域中普遍存在的两极分化现象。《道德经·七十七章》有载：“天之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其实这也正是老子的一道哲学命题。人们既有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会影响对收入增长的感知。尤其是增值较大的房产，有和没有，多和有少，对人们收入增长的影响十分明显。

那么，要想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就得从收入分配制度上做文章。今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之年，改革形势错综复杂、利益格局盘根错节，尤其涉及收入分配这一直

## 奥斯卡奖带来的启示

又到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颁奖季。美国电影奖数量多达960多种，其中当推奥斯卡奖最具规模和权威，创设80多年来备受全世界关注，现在每届约有10亿人收看其直播或录播的颁奖典礼，其传播力和影响力不可小觑。

奥斯卡奖在中国的传播从上世纪30年代就已开始，对中国电影的影响不容忽视：一些导演、演员等主创人员以获奥斯卡奖为荣，拍片大多参照奥斯卡获奖影片的美学标准，每每奢望“申奥”或“冲奥”成功；一些电影奖的评选、颁发模式和流程照搬奥斯卡奖，等等。当然正面效应也有，例如促使中国电影契合社会思潮和大众趣味，在艺术上创意、技术上精进。

奥斯卡奖及其获奖影片所组成的品牌系统对中国电影产业如何做大做强不无启示。比如，好莱坞电影虽然标榜娱乐性，其实很讲政治。那些美式超级英雄大片，包括《逃离德黑兰》，无一不宣扬大美国主义，显示了文化霸权。而反观国内，去年我国电影票房总收入230亿元，堪称全球第二。然而现在我国的观众人次仅及美国的1/4，影院平均上座率仅15%。而观众人次正是电影生态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指数。此外，应该抛弃对明星的迷信和过分依赖，大力培养新人、启用新秀。本届奥斯卡4项表演奖的入围者就有7位是首次获得提名，他(她)们道劲功，演绎真实，让人耳目一新。

在我看来，中国电影应该继续角逐奥斯卡奖。北美是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而获奥斯卡奖正是最佳的营销方式。但“走出去”并非为个人争名夺利，也远非简单的“情结”使然。奥斯卡奖是展现中国的软实力、宣传中国的核心价值、传递当代中国正面信息的重要窗口。在此过程中也要注意，决不可一味迎合老美们的猎奇心理和东方主义观念，应该多一些充满中华文化底蕴、富有独特人性内涵的电影。

严敏

利益时，如何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打破垄断导致的收入畸高局面，让更多人“敢花钱、花得起钱”，必须直面解决，这项任务刻不容缓。发展的蛋糕越做越大，人们期待蛋糕分得更好，更加公平。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障。收入分配问题极其复杂，也是老百姓目前最为关注的问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一方面，居民收入一直保持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的现象，弥合好这一扭曲的鸿沟，我们期待“两会”的智慧和进一步的努力。

宋华

# 让改革弥合收入增长与“不满意”间的鸿沟